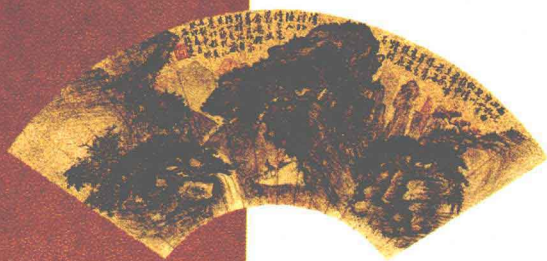


中国风雅文化

仁者乐山，
智者乐水



山中藏石，水中藏

乎？

仁智的乐趣 山水泉石

董天策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天津出版社

仁智的乐趣
山水泉石

董天策
著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天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仁智的乐趣：山水泉石 / 董天策著. — 北京：文
津出版社，2013.4

ISBN 978-7-80554-583-7

I. ①仁… II. ①董… III. ①审美文化—中国—通俗
读物 IV. ①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018832 号

仁智的乐趣



*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
文津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

邮政编码：100120

网址：www.bph.com.cn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总发行

新华书店总经销

北京溢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787 毫米×1092 毫米 16 开本 13.75 印张 130 千字

2013 年 4 月第 1 版 2013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554-583-7

定价：30.00 元

质量监督电话：010-58572393

前言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在人与山水自然的相互作用过程中，中国历代文人士大夫创造了独具特色的山水文化，极大地丰富了中国风雅文化的内涵。

中国疆域辽阔，山河壮丽，美不胜收，不仅为炎黄子孙提供了强大的物质生活基础，而且还提供了丰富的精神生活食粮。早在两千五百年前，孔子就意味深长地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

“知者”即“智者”，就是智慧之人；“仁者”则是仁义之人。为什么说“知者乐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接下来写道：“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这似乎在作解释，但意思仍不够显豁。所以后人又加以解释说：“知者达于事理，而周流无滞，有似于水，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而厚重不迁，有似于山，故乐山。”（朱熹《论语集注》卷三）原来，因智慧而超脱的人像流动的水一样快乐，信奉仁义道德的人像沉静的山一样恒久。换言之，仁者、智者的品德情操与山水的自然特征和规律性具有某种类似性，因而产生乐山乐水之情。

孔子虽然把仁、智的乐山、乐水分开来说，但山水本来就密不可分，仁智也具有内在联系，因而后世文人士大夫在乐山乐水的时候，并不理会仁智之别，更不论山水之异，总是完完全全地拥有山水自然，浑融无碍地享受山水之乐。

山水之乐，乐在何处？在一般人的直觉中，山水之乐就是游山玩水之乐。的确，“古往”有文人士大夫登临览胜的传统，“今来”有国内外人士回归自然、旅游天下的时尚。首先想到山水游玩也很自然。不

过，倘若全面地考察古代文人士大夫与山水自然的关系，我们就会发现，仁者智者的乐山乐水有着更深更广的文化意蕴。

在老子和庄子那里，清幽宁静的山水自然是抗拒纷争动荡的现实社会的有力武器。深受老庄思想影响的文人学士纷纷高蹈出尘，栖处山林，借以保持自身人格的独立完善，激扬着一种隐逸生活情调。与此同时，在滚滚红尘中奔波忙碌的官僚士大夫，为了摆脱人世间的种种烦扰苦恼，也总是凭借着他们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实力，大兴土木，“城市起山林”，建成美丽的园林居处环境，在享受世俗生活荣华富贵的同时，尽情享受山水泉石的清幽雅致。这样一来，优游山水，寄情泉石，以获得至高无上的审美享受，就成为文人士大夫乐山乐水的应有之义。

“天下名山僧占多”，其实道士也同样占据名山大川。僧人道士如何占据山川名胜，不在我们的考察范围之内。但文人士大夫遨游山水的时候，也常常访道求仙、谒僧参禅，从而使文人士大夫的山水文化包含着一定的宗教内容。

山水自然除了供文人士大夫登临游赏和宗教体验而外，还是他们开阔眼界、陶冶情操、激励意志，以及进行艺术创作和科学考察的所在。因此，人类文化的创造过程在山水泉石中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

在仁人志士眼中，山水自然还与个人遭遇、国家兴亡、世道沧桑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密切联系，他们在关注大好河山的时候，往往注入了对社会、国家、人生、历史的深切情怀。于是，山水自然也因不断地被“人化”而显得异常博大。

如此看来，人间的真、善、美在文人士大夫与山水自然的关联中得到了充分体现。本书就是从不同角度、不同侧面去描述文人士大夫面临山水泉石之际的行为方式与精神追求，尽可能全面地展示山水泉石之中闪耀着真、善、美的仁智情趣。

目 录

前言 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1

第一章 山林水泽中的隐逸高情 /1

- 一 逍遥于天地之间 /2
- 二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9
- 三 山中宰相与终南捷径 /16
- 四 功成身自退，江湖别有天 /24
- 五 桃花源：隐士的乐园 /29

第二章 让山水泉石与居处生活同在 /37

- 一 园林：居处生活的理想王国 /38
- 二 叠石疏泉，引来山水幽致 /48
- 三 江山无限景，都聚一亭中 /58

第三章 登临览胜，其乐无穷 /69

- 一 登山临水咏诗行 /70
- 二 群聚兰坡，宴游雅集 /79
- 三 不下堂筵，坐享泉壑 /90

第四章 求仙参禅，原来与山水之乐同趣 /99

- 一 游仙其实是游山 /100

- 二 水流花放，悟彻慧通
——与山水浑然一体便是参禅 /108
- 三 一言道合，止于山亭三日
——交游僧道使名山更添风雅 /118

第五章 跋山涉水，求索真知 /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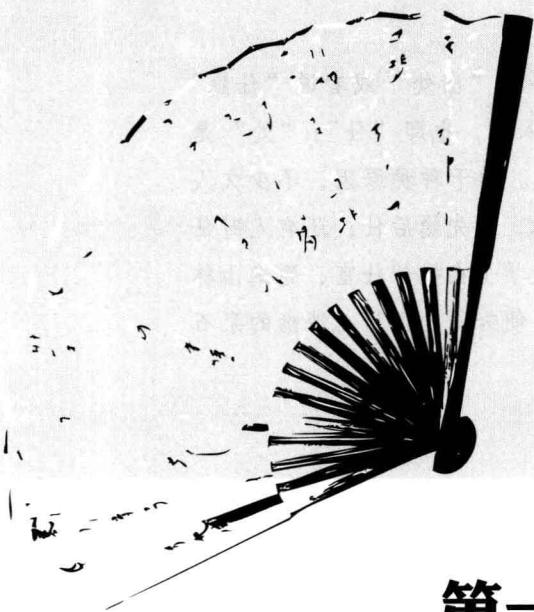
- 一 投迹山水地，放情咏《离骚》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130
- 二 搜尽奇峰打草稿 /136
- 三 人知游山乐，不知游山学
——游历名山大川与科学考察 /141

第六章 水驿山程与宦游情结 /151

- 一 多情自古伤离别，山为无色水呜咽 /152
- 二 山一程，水一程，何日是归程 /160
- 三 迁谪途中的深长悲慨 /168
- 四 一丘一壑也风流：仕宦失意时的追求 /175

第七章 浩歌慷慨山河颂 /183

- 一 戍守边关，捍卫壮丽河山 /184
- 二 山河破碎，志士悲伤 /191
- 三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199
- 后 记 /208



第一章

山林水泽中的隐逸高情



在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的人生道路不外“出处”或者说“仕隐”两途。“出”是“出仕”，追求仕宦，出将入相，也即“仕”；“处”是“隐居”，退处山林，隐居求志，也即“隐”。由于种种原因，不少文人学士栖处山林，终生不仕；也有人先仕后隐，或先隐后仕；还有人时仕时隐，时隐时仕。不管怎样，历史上的文人学士在抛却仕宦、隐逸山林的过程中，却深刻地沟通了人与山水自然，使秀丽的山川、清幽的泉石折射出中国文化中特有的隐逸情趣。

一 逍遥于天地之间

两千多年以前，庄子在《让王》中写道：

舜以天下让善卷，善卷曰：“余立于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悲夫，子之不知余也！”遂不受。于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处。

这个故事是说，上古时代的圣明君主舜要把天下让给善卷，善卷却推辞不受，认为自己有衣有食，自行劳作，逍遥自在，日子过得很舒坦，哪里愿意劳心烦神去治理天下呢？于是遁入深山老林，去继续那逍遥于天地间的生活。

在庄子笔下，这个善卷是隐逸之士的典型。所谓隐逸之士，就是逃避现实，不要高官厚禄的人，有隐士、逸民、高人、处士等不同的称呼。善卷连天下都不要，显然是个大隐士。尽管其人其事是庄子虚构出来的寓言，却相当真实地表达了庄子的隐逸思想。

《庄子·秋水》中也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惠施做了魏国的相，庄子前去看望他。有人对惠施说：庄子这次来，是想取代您的相位。惠施听



[明] 戴进《溪边隐士图》

在公元前 369 年到公元前 286 年之间。他曾一度做过蒙这个地方的漆园吏，不久即辞职归家。因家境贫穷，有时靠编织草鞋卖钱过日子，在揭不开锅时，曾向监河侯借过米。但庄子甘于贫困，对荣华富贵不屑一顾。一天，庄子在濮水钓鱼，楚王派大夫二人前往聘他为相，他手执钓竿头也不回，对来人说：我听说楚国有个神龟，死了三千年，楚王还把它的骨甲珍藏在庙堂上。请问，对于龟来说，它是愿意死去而使自己的骨甲得到楚王珍藏呢，还是宁愿活着拖着尾巴在泥水中爬行呢？楚国大夫说，当然宁愿活着能自由地爬来爬去啰。庄子就这样谢绝了楚王：

了很恐慌，在国都搜查了三天三夜，要捉拿庄子。庄子得知此事，感到可笑，对惠施说：您知道南方有一种名叫凤凰的鸟吗？这凤凰从南海出发，飞向北海，不是梧桐树不栖，不是洁净的果实不吃，不是甘美的泉水不喝。地上有只鸱鸟，正在大吃一只腐烂的老鼠，凤凰从天上飞过，鸱鸟担心它来争夺腐鼠，连忙仰头冲着凤凰大“喝”一声，想吓唬一下凤凰。眼下，您是想为了您的魏国相位而吓我吗？把这个故事与前面的故事相对照，就很清楚地表明庄子本人也正是善卷一类的隐士。

庄子，姓庄，名周。战国时蒙（今河南商丘东北）人，属宋国。生活年代大约

“我宁愿游戏于污渎之中自快，无为有国者所羁。终身不仕，以快吾志焉。”（《庄子·秋水》）



[宋] 李唐《采薇图》

庄子为什么要追求逍遥自得的人生境界呢？答案深深地根植于当时的社会现实。《庄子·山木》说：魏王见庄子穿着破衣、破鞋，显得非常潦倒狼狈，就问：“您怎么这样穷愁潦倒啊？”庄子回答说：“处在一个上昏下乱的时代，怎么能不穷愁潦倒？”春秋战国之际，古代中国在政治、军事、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都处于剧烈变革的过程中，旧的秩序打破了，新的秩序尚未确立，整个社会动荡不安。面对这样的现实，“故全德之士，韬精保真，悟历数之在运，知存亡之匪人，将扶危而翼颠，犹一发之擢千钧，块壤之壅长津。所以守嘉遯之元吉，以少微之隐沦”（吴筠《逸人赋》）。如此，庄子以隐逸的方式养生适性，逍遥自得，追求个体生命的本体意蕴。所以每当社会现实动乱不安或是改朝换代之际，总是有大批的隐士出现。商周之交的伯夷、叔齐，秦末汉初的“商山四皓”，西汉、东汉之交的严光，魏晋之际的“竹林七贤”，齐梁之际的陶弘景，五代末年的陈抟……这些著名的隐士就是典型代表。

怎样才能“逍遥于天地之间”呢？不同时代，不同个人有其相应的隐逸方式。纵观三千年来隐士的所作所为就会发现，他们或栖处岩壑，或隐逸田园，或漫游江湖，或为僧为道，与山水泉石结下了不解之缘。

栖处岩壑，就是隐士逃往深山幽壑，湖畔溪侧，在那树林茂密、水波浩渺、没有多少人烟的地方居处下来。这是人们认为最高尚的隐逸方式，也是很多隐逸之士选择的生活方式。从上古到魏晋，隐逸山泽之人多半过着岩居穴处的简陋生活。《庄子·达生》中说，“鲁有单豹者，岩居而水饮，不与民共种”。皇甫谧《高士传·老莱子传》载，老莱子“莞葭为墙，蓬蒿为室，枝木为床，蓍艾为席”。《后汉书·逸民传》载，东汉时，台佟“隐于武安山，凿穴为居，采药自业”；矫慎“少好黄老，隐遁山谷，因穴为室”。《晋书·隐逸传》载，晋时，张忠隐于泰山，“其居依崇岩幽谷，凿地为窟室，弟子亦窟居”；公孙凤隐于九城山谷，“冬衣单布，寝处土床，夏则并食于器，伫令臭败，然后食之，弹琴吟咏，陶然自得”。倘若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样的岩居穴处哪里谈得上什么“逍遥”，简直是“苦行僧”了。不过，当时的隐士倒是以这样的清贫为高雅，的确能够泰然处之。正如宋人罗与之在《雪坡小稿》中所吟咏的那样：

才难济世甘避世，心不愁天唯乐天。

林下山间深密处，曲肱饮水兴悠然。

归隐田园，就是隐居于田园山水。早在孔子的时代，就有长沮、桀溺以躬耕于田亩之中为隐。诸葛亮隐居南阳，“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三国志·诸葛亮传》）。陶渊明弃官归隐，“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归田园居五首》其一），好不自在洒脱。魏野隐居田园，“手植竹树，清泉环绕，旁对云山，景趣幽绝，凿土袤丈，日乐洞天。前为草堂，弹琴其中。好事者多载以酒从之游，啸咏终日”（《宋史·魏野传》）。

汉代以后出现了一种新的隐逸方式，这就是漫游江湖。如姜肱“隐身遯命，远浮海滨”（《后汉书·姜肱传》）；宗炳“好山水，爱远游。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宋书·宗炳传》）；宗测“好山水，游山时唯以《老子》《庄子》自随”（《南齐书·宗测传》）；戴复古“南适瓯闽，北窥吴越，上会稽，绝重江，浮彭蠡，泛洞庭，望匡庐、五老、九疑诸峰，然后放于淮泗，归老委羽之下”（毛晋《石屏词跋》）。

六朝以后，随着佛教和道教的兴盛，以僧道为隐又成为一种新的风尚。僧道栖于山林，没有官职，不侍王侯，本来就有几分像隐士。“地形各占幽深境，天产俱为散逸才”，魏野《书润师白莲堂》中的这两句诗，准确地概括了隐士与僧道的共同之处。齐梁之际的陶弘景是当时道教领袖，《南史》让他入《隐士传》；五代末宋代初的陈抟是著名道士，《宋史》让他入《隐逸传》，都认为他们是真正的隐士，是一种穿着缁衣的隐士。智圆自称中庸子，他买杭州孤山夕阳之坡的玛瑙禅院作为自己隐居的地方，经门人浩才主持重建，具有“楼台亭阁，泉石翠竹”之盛（智圆《闲居编》卷一三《玛瑙重结大界记》），与俗家隐士的隐居并无二致。他在《贫居赋》（《闲居编》卷三）中这样表述其生活和思想：

荒径草深兮衡门长扃，坏壁虫响兮幽砌苔青。饘粥糊口兮吟咏适情，行披百氏兮坐拥六经，穷困而通兮盘桓居贞。嗟乎薄徒兮附势尚声，奔走要路兮骑非衣轻，宴安华居兮狼心豕形。岂思止足兮安戒满盈，名随身没兮祸逐贫生。焉知忠士守仁义，簞食瓢饮不改其乐兮，垂万世之令名哉。

对薄徒的斥责和自己安贫乐道的表白，正是十足的隐士思想。智圆的这番表白，完全像出自一位俗家隐士之口。可以这样说，智圆是戴着黄冠的隐士。宋代杭州孤山有六人隐居，除林逋一人是俗家之外，其余五人都是和尚（智圆《孤山述》，《闲居编》卷一六）。

在中国古代，一个人一旦或栖处岩壑，或归隐田园，或漫游江湖，

或隐于僧道，就从现实社会中超脱出来，就摆脱了君臣关系的约束，摆脱了名缰利锁的羁绊，就可以“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在天下地上做个逍遥自在的人了。

“逍遥”最基本的含义就是优游自得，就是在没有任何外界压力的情况下，随心所欲地做一些让自己感到快乐舒适的事情。倘若什么事都不做，也会闷得发慌，闲得无聊，是根本谈不上什么逍遥的。那么，隐逸之士都干些什么呢？吕南公在《豫亨诗序》中曾说：

吾耕有禽，吾樽有酒，吾丝竹有音，吾架有书，吾壁有琴，吾局有棋，吾园有花木，吾池有鱼。可寄，可醉，可听，可读，可弹，可弈，可玩，可钓。无非乐事。

吕南公列出了隐逸逍遥的种种乐趣。倘若细论，这张逸乐“清单”上还可以增补若干名目。譬如，有山可樵，有水可渔，有泉可茗，有石可赏，有诗可吟，有画可绘，有药可采，有丹可炼，有兽可驯，有禽可养，有友可交，有道可论，有禅可参，有理可悟，等等，真是不一而足。

当然，任何一个隐逸之士都难把如此丰富多彩的隐逸乐趣享受殆尽，只能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其中诸端加以享受。实际上，也只要享有数端，也就足以逍遥于天地之间了。请看：

庄子隐居在家，以著述为事，“著书十余万言”（《史记·老庄申韩列传》），为我们留下一部汪洋恣肆、妙趣横生的《庄子》；

郑子真“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躬耕于谷口岩石之下（《汉书·王贡两龚鲍传》）；

梁鸿隐居霸陵山中，“以耕织为业，咏诗书弹琴以自娱”（《后汉书·梁鸿传》）；

严光与汉光武帝刘秀同学，光武即位，他变换姓名，身披羊裘，垂钓泽中七里滩（《后汉书·严光传》）；

董景道东汉永平年间“知天下将乱，隐于商洛山，衣木叶，食树

果，弹琴歌啸以自娱”（《晋书·董景道传》）；

庞公，“居岷山之南，未尝入城府”，不愿出仕，后来“携其妻子登鹿门山，因来约不返”（《后汉书·庞公传》）；

嵇康居山阴，与阮籍、山涛、向秀、刘伶、阮咸、王戎，“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

刘伶，“常乘鹿车，携一壶酒，使人荷锺而随之。谓曰：‘死便埋我’”（《晋书·刘伶传》）；

支遁因人就深公，买印山而隐居，好不逍遥（《世说新语·排调》）；

陶炎，“颇好读《易》，善卜筮”，在长沙临湘山中结庐隐居，“养一白鹿以自偶”（《晋书·陶炎传》）；

陶渊明隐居在家，“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羲皇上人”（陶潜《与子俨等疏》）；

“宗炳、王微，皆拟迹巢由，放情林壑，与琴酒而俱适，纵烟霞而独往”（张彦远《历代名画记》）；

孔淳之，“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穷幽峻，或旬日忘归”（《南史·孔淳之传》）；

刘凝之，“携妻子泛江河，隐居衡山之阳”，“采药服食，妻子皆从其志”（《南史·刘凝之传》）；



[清] 禹之鼎《幽篁坐啸图》



[元] 刘贯道《梦蝶图》

朱百年，“少有高情，亲亡服阙，携妻孔氏入会稽南山，以伐樵采簪为业”（《南史·朱百年传》）；

沈麟，“织帘诵书，口手不息”，“隐居馀干吴差山，讲经教授，从学者数百人”（《南史·沈麟士传》）；

林逋，“结庐西湖孤山”，“所居多植梅畜鹤，泛舟湖中，客至则放鹤致之，因谓梅妻鹤子云”（吕留良等《宋诗钞·林和靖诗钞序》）；

.....

类似的例子，实在举不胜举。逸人高士能够如此崇拜自然，蔑视权贵，徜徉高蹈，飘然出尘，获得生命本体与个体精神的自由，确乎是“逍遥于天地之间而心意自得”。

二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

隐逸之士看起来“遗世而独立”，不关心社会治乱，不理睬功名利禄，大有不食人间烟火的味道。事实上，除一部分反感官场，不愿仕宦，企图明哲保身、平平安安、悠悠闲闲地过一生的老庄之徒而外，不少人是由于追求仕宦不得才愤而转向山林的。所谓“振衣千仞冈，濯足

万里流”的呼唤和实践，就集中体现了中国隐逸文化的这一侧面。

“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流”是左思《咏史》（其五）的名句。



[清] 金廷标《竹溪六逸图》

左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市东）人，出身寒门，少年时代在其父左熹的激励下勤奋学习，颇擅文辞。泰始八年（272年），左思二十岁，因其妹左棻被选入宫中而移家洛阳。左思自恃才高，又与皇帝攀上了亲戚，产生了“梦想骋良图”（《咏史》之一）的幻想，希望能得到重用。然而，当时正是以司马氏为代表的世族地主当权的时代。自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以后，已逐渐形成根深蒂固的世族门阀制度，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晋书·刘毅传》）的局面。世族与寒门，不仅等级森严，而且这种等级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世袭性，窃居要位的，“非公侯之子孙，则当涂（引者注：指当权者）之昆弟”（《晋书·段灼传》）。出身寒门的左思自然难得重用，只得到秘书郎这样的闲散之职，根本不可能实现他“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咏史》之一）的壮志理想。面对这种残酷无情的现实，左思《咏史》（之二）愤懑地写道：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世百尺条。
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
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